

理论法学在中国

本期视点:法学方法论研究

# 规则的普遍性与类比推理

陈景辉

(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8)

**摘要:** 虽然现有围绕如何降低类比推理任意性的问题展开的研究非常之多, 但是有关类比推理产生原因的讨论非常缺乏。如果不能有效地解说类比推理产生的原因, 那么其他的讨论都会丧失牢固的基础。类比推理的运用来自于规则的普遍性之外的特例——潜在包含, 只有了解这一点, 才能准确把握类比推理的重要性就在于规则的目的。

**关键词:** 规则; 潜在包含; 类比推理

**作者简介:** 陈景辉(1973-), 男, 黑龙江鸡西人, 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教师, 黑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理论与法制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从事法理学、法学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08)01-0076-06 收稿日期: 2007-09-17

## 一、问题与结构

类比推理是主要的法律推理方法之一, 对于司法裁判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我看来, 这些研究成果都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就是对于类比推理产生的原因并没有深入的讨论。如果缺乏这个部分的探索, 就会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 这将会导致以不恰当的方式对待类比推理, 或者像概念法学的主张一样过分贬低类比推理的作用, 或者过分夸大类比推理的功能, 将类比推理视为整个法律推理的核心特征<sup>[1]</sup>; 另一方面, 由于类比推理并非是演绎推理那样“必然性”的推理形式, 因此类比推理的运用具有相当程度的任意性。现有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试图寻找有效降低或者从根本上克服类比推理任意性的具体举措, 但是如

果不清楚类比推理产生的来源, 那么所有这些举措终将会落得无的放矢的下场。由此可见, 讨论类比推理产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本文认为, 类比推理是与伴随规则出现的“潜在包含”的特点直接相关的, 因此必须在了解规则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把握类比推理产生的条件。换言之, 如果将法律要素分为规则与原则这两种类型, 那么类比推理只与法律规则有关, 而不涉及法律原则问题。这是因为, 规则的适用与涵摄这个演绎推理方法必然联系在一起, 而原则的适用必然是以权衡为中心展开的<sup>[2](P77-94)</sup>。而类比推理通常被认为是补充演绎推理的重要推理方式, 因此一定是类比推理出现了某些问题, 才需要对此进行补足。那么本文的问题就相应地被细化为: 规则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导致演绎推理(涵摄)无法有效地使用? 围绕这个问题, 本文将

会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一,规则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在这些性质的限定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例外情形?第二,这些例外情形是否会摧毁规则的基本性质?第三,如何处理规则的这些例外?从整体上讲,规则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因此规则会出现“潜在包含”与“过度包含”的例外情形。由于规则的普遍化是稳固的(否则规则就不再是规则了),因此就需要借助类比推理来解决“潜在包含”的问题(过度包含主要借助法律解释的理论解决)。至于如何降低类比推理任意性的问题,则在此不论。

## 二、规则普遍性与例外

规则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对其范围内的所有事项概莫能外地产生有别于自行权衡的影响,也就是说,所有处于规则约束范围的行为选择,都必须按照规则(而不是自行权衡)作出,这就被称为规则的普遍化特征。规则的这个特点与其结构上的要素紧密相关。任何规则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涉及规则适用对象的假定条件与随之而来的后果<sup>[3](P23)</sup>。所谓的假定条件,就是指规则适用的范围,它也是规则得以适用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当某一事项符合规则的假定条件,那么规则将对它适用;如果规则适用于某一事项,那么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符合了规则的假定条件。正因为如此,不存在缺乏假定条件的规则<sup>[4](P15)</sup>。如果某一指令性的表述中其假定条件是可有可无的,那么也难以将这个表述合理地称为“规则”。而后果是一个道义符号(deontic operator),是与假定条件相关的有关禁止、允许或约束的规定。后果与假定条件直接相连,当某一事项落入假定条件的范围之内,结果就会适用于其之上<sup>[3](P24)</sup>。规则的后果可能展现为多种类型:它极可能仅仅表现为对处于假定条件范围内之事项的肯定(有效),也可能仅仅表现为取消处于假定条件范围内之事项的效力(无效),还可能表现为对于该种事项的处罚举措。必须注意,在表现为处罚的规则后果中,它可能以相当具体的方式被陈述出来。当然,在附加前两种后果的严格规则中,这些后果并不必然以清晰的方式被表述出来,而往往是通过人们的推论获得的。

如果我们将规则的假定条件与后果暂时分离,就会发现:规则的普遍化实际上是来自于其假定条件的普遍化,而与后果无关。必须注意,“普遍

性”这个概念指的是规则对其所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一律适用的性质,因此与其相对立的概念就是“个别化”,因为这个概念表明的正是适用规则时要抛开普遍化,就事论事地针对个别情形选择性地适用。例如“不得酒后驾车”这个规定之所以是严格意义上的规则,是因为依据这个规则,所有“酒后驾车”的行动都应当是被禁止的行动。这里面的普遍化指的就是对于“所有”酒后驾车者一律使用的性质。而“不得醉酒驾车”的规定看起来像规则,但是实际上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规则,这是因为对于“酒后驾车者”是否达到醉酒的状态的判断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喝一点就会醉酒,有的人喝一斤白酒都不醉),除非规定“血液中酒精含量多少视为醉酒”,才能将这个规定转化为严格意义上的规则。显然,规则的普遍性指的就是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个体。既然“普遍性”概念是规则之假定条件的性质,因此假定条件所设定的范围不同,普遍性的范围也就相应不同,这也使得规则的适用范围或宽或窄。例如:“不得酒后驾车”的规则就比“雨天不得酒后驾车”的规则所适用范围更广,当然“雨天不得酒后驾车超速”就是适用范围最窄的规则。规则适用范围的宽窄是受制于表述该规则的语词的意义范围。

如果从产生的先后顺序这个角度看,所有的普遍化都来自于一般化。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想得到一个普遍化判断时,我们总是先选取一个个别化的对象,通过对其某些特征的总结与描述,形成普遍化的判断。就像我们之所以禁止酒后驾车,一定是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某一驾驶者酒后驾车(可能或者实际上)引发了车祸,危及驾驶安全。经过反复的总结,我们发现避免这种情形再次发生的唯一手段,就是制定“禁止酒后驾车”的规则。显然,禁止酒后驾车这个普遍性规则是来自于个别性事件的。但是,需要注意,虽然普遍性来自于一般性,不等于说普遍性就是一般性的简单复现,而是来自于对个别情形的抽象化处理:通过总结和研究从个别情形抽象出与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而以这个问题为核心形成普遍化的规则。所以,虽然普遍化始于个别化,但是最关键的是就个别化情形中抽象出来的核心问题,因为这个核心问题正是普遍化规则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在面对“该规则为何存在”的疑问时,借以证明规则存在的理由。这就是规则的目的,也可以称为规则的正当化基础<sup>[3](P26)</sup>。

当我们说, 由于规则的假定条件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因此规则在适用上也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时候, 经常面对这样的批评: 依据规则的正当性基础, 规则适用过程本身是具有过度包含 (over-inclusive) 与潜在包含 (under-inclusive) 的可能。因此, 虽然在通常时, 规则应当以普遍的方式得以适用; 但是在面对如上两种情形时, 规则应当具有“个别性”适用的特点。所以, 将规则的性质简单地确定为“普遍性”是不恰当的。这样的批评是正确的吗?

所谓的过度包含, 是指某一事项虽然处于规则的假定条件范围之内, 但是规则的适用, 并不会产生规则的实质规范目的所期待或者所欲加以避免的后果<sup>[3](P32)</sup>。因此, 如果依据严格规则背后的规则目的进行判断时, 这种不应包含其中的情形应当自规则的适用范围之中排除出去。换言之, 从表面上看, 某一事项属于规则适用的对象, 但是将规则适用于该对象并不会产生规则所欲实现的目的, 因此这些事项就是规则不应当包含的内容, 虽然规则实际上并没有将其排除。例如餐厅门口树立“禁止携狗入内”的告示, 其目的是防止狗对于就餐者的不当影响, 仅就该规则的字面含义而言, 导盲犬、警犬也同样应当被禁止带入餐厅; 然而, 导盲犬和警犬可能并不会打扰就餐者用餐, 因为这些种类的狗可能受到过良好的训练, 所以就规则的目的而言, 这些狗并不是应当被禁止入内的对象。与过度包含不同, 所谓潜在包含, 是指某一事项虽然并未包含在规则的假定条件之内, 但是由于这些情形符合规则所欲实现的目标, 因此被认为应当对其适用规则<sup>[3](P25)</sup>。例如, 餐厅门口树立“禁止携狗入内”的告示, 其目的是防止狗对于就餐者的不当影响, 仅就该规则的字面含义而言, 年幼调皮的孩子或者狗熊、猴子之类的宠物显然并未被该规则所包含在内, 但是孩子和狗以外的宠物同样会影响就餐者的就餐, 甚至比狗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 因此根据规则的目的, 也应当同样禁止孩子和狗之外的其他宠物入内, 虽然没有人会将孩子等同于狗或其他宠物来看待。

依据“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批评了规则的普遍化属性的做法, 来自于将规则的普遍化与规则的目的结合起来分析的结果。因为在它们之间的确存在冲突的可能性: 或者某些事项处于普遍性条件的范围之内 (规则包含), 但却没有满足

规则目的的要求 (规范目的不包含); 或者虽然处于规则之外 (规则不包含), 但是却是规则目的指向的内容 (规范目的包含)。这两种情形分别代表了规则 (普遍化) 的“误用”或者“未充分运用”的特例。由于规则是以规则之目的作为正当性基础, 因此规则最恰当的适用应当是参照规则的普遍性与规则之目的综合考量的结果。也只有这样, 才不会产生如上两个问题。由此推导出的结果就是: 必须抛弃规则的普遍性观念。

### 三、规则的稳固普遍化

如何看待过度包含、潜在包含与普遍化的关系, 反映我们如何看待普遍化的性质。我们可以认同依据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的概念对普遍化展开的批评, 这种批评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 在一般情况下认可普遍化概念的意义, 即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普遍化范围内的所有对象; 第二, 在出现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的情形时, 结合规则的目的加以说明, 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于规则的修正。这种观点被称为“交流模式” (the model of conversation)。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以另外的形式看待普遍化: 即在出现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的情形时, 依然维持普遍化的稳定性, 以同样的标准对待普遍化范围内的所有事项, 而不因为特例改变规则的普遍化属性。这种观点就是所谓的“稳固模式” (the model of entrenchment)。交流模式与稳固模式的区别, 实际上是普遍化的特例 (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 是否影响到普遍化的概念, 以至于规则需要因此加以修正<sup>[3](P42)</sup>。表面上看, 交流模式具有非常强的支持理由: 其一, 交流模式实际上是运用规则的正当化基础——规则的目的——作为衡量普遍化恰当与否的标准, 所以这个理由本身就是有正当性的, 因为普遍化本来就是建立在规则之目的的基础上。其二, 如果在出现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之类的特例时不对规则加以修正, 那么对于这些特例附加规则后果的做法就是不适当的; 因为这等于说, 将错误的规则适用于正确的对象 (潜在包含) 或者将正确的规则适用于错误的对象 (过度包含); 无论出现以上哪种结果, 显然都不是一个可以顺利接受的恰当结果。正是基于这些理由, 抛弃稳固模式可能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然而, 这样的主张却是错误的: 首先, 交流模式过于理想化了 (ideal)<sup>[5](P59-61)</sup>, 因为这必须以我

们能够发现所有的一致或者未知的事项的所有特点为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排除所有潜在包含与过度包含的情形的规则,也只有这种规则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普遍性特例的困扰。然而,要想发现所有事项的全部特点,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必须以全知全能的“神”作为规则的颁布者才行。即使有人声称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实他不过是以此为借口,通过否认其他人借助规则目的批判普遍性观念的资格,达到否认规则普遍性特例的目的。

其次,当然,除了借助全知全能的“神”来解决问题之外,我们仍然有其他选择:制定一个普遍性的规则,但是允许人们在出现普遍性特例时,依据规则的目的修正普遍性的范围(以限制或者扩充普遍性范围的方式)。这是一种被称为“规则敏感性的特殊主义”(rule sensitive particularism)的做法<sup>[6](P43-44)</sup>。然而,我们将会发现,如果依据规则敏感性的特殊主义修正规则普遍化的范围,实际上是以一个更大或者更小的普遍化范围取代原有的普遍化范围<sup>[3](P50)</sup>。比如说,我们将餐厅门口的告示修改为“不得携带盲犬与警犬以外的狗入内,也不得携带顽皮的儿童、熊和猴子入内”这个进一步的规则,这个规则的普遍性范围显然与“不得携带狗入内”的范围有所变化,也更加能够符合规则目的的要求。然而,这个做法并没有消除普遍化特例问题的困扰,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后面的这个经过修正的规则仍然会受困于由其自身产生的新的普遍化特例,毕竟我们不能说除此之外就不存在其他的特例了,而且在未来可能出现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新的特例<sup>[9](P57)</sup>。所以,任何基于特例对于普遍化观念的新修正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无穷的再次修正,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发现新的特例。为了阻止这种无穷的再次修正,就只能有以下两个注定失败的选择:或者干脆抛弃严格规则的观念,但是这个做法并不恰当,因为这等于说取消作为二阶理由的严格规则存在的必要性;或者回到上面那个求助于全知全能的“神”的做法。

再次,普遍化的获得过程虽然始于个别化的例子,但是它并非对于个别例子的简单处理,而是依据规则目的进行的抽象化处理<sup>[7](P24)</sup>。在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中,一些因素已经被抽象化过程所排斥,虽然这些被排斥的因素可能对于个别事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虽然所有的

宠物被带入餐馆都可能一定程度上打扰人们的用餐,但是由于狗是人们最为常见并且最愿意带出门的宠物,而且在有个别携带宠物狗进入餐馆打扰就餐者用餐的情形出现后,人们因此才设定“不得携狗入内”这个规则。在这个规则制定的过程中“狗的特殊种类”、“与狗有同样影响的其他生物”等等因素实际上已经属于被抽象化过程省略的部分。重新将这些因素加入规则之中,只能带来最终摧毁规则观念的结果。

最后,由抽象化处理而来的普遍化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新出现的问题能够因与当下的处理办法发生联系,而找到可预期的处理依据<sup>[3](P43)</sup>;另一方面,普遍性观念又简化了对于待决问题的处理,而不是每当面临个别情形时总要考虑它是否属于普遍化的特例<sup>[3](P53)</sup>。其中,前一个方面保障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性,而不再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扰,因为无论出现什么新的情形,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已有普遍性观念的新变种,很难出现从未与现有经验相关的绝对的新情形<sup>[3](P43)</sup>。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该情形是一个全新的情形,但是这是一个要求极高的判断,不能成为我们经常使用的判断。正是因为这个要求是如此之高,所以第二个条件存在的意义就更加明显,规则的普遍性将会极大地排除个别情形对于普遍化的困扰,也打击了那种对于通过举出自己身处普遍性特例的方式来摆脱规则约束之行为的变相鼓励<sup>[7](P27)</sup>。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的存在,就使得规则的普遍化是以一种“稳固”的方式存在的。所谓稳固的普遍化,就是肯定在出现普遍性的反例时,依然需要依据普遍化的标准来处理;而不能借助规则之目的影响,随意推翻普遍化观念。换言之,规则的普遍化仍然会稳定地决定最终的处理结果,即使违反了规则的目的,也应当依然如此<sup>[3](P53)</sup>。因为,规则的明晰性、确定性与决定性的获得是以支付如下代价为条件的:规则定义的情形(普遍化)比规则背后的理由所欲包含的对象或多(过度包含)或少(潜在包含)<sup>[8](P447)</sup>。这表明,规则的普遍化与规则的普遍化特例是共存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批判的关系,所以就不能将普遍化的特例视为批评普遍化观念的理由。

#### 四、潜在包含与类比推理

显然,作为二阶理由的严格规则,同以供权

衡的理由面目出现的规则之目的之间, 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因此就会产生过度包含与潜在包含的问题。这种差别表现在法律上, 就被称为“(目的) 缝隙”(gap)<sup>[9]</sup>或者“不对称性”(asymmetry)<sup>[10][11](P70-71)</sup>。所谓的目的缝隙, 就是指法律规则指导我们以某种方式行为, 而相关的理由则指导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行为<sup>[6](P42)</sup>。目的缝隙不但展现了规则与作为行为理由的规则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裁判者在个案中的判决选择, 而且也展现了对于裁判者判决结果的不同辩护方式: 在规则之下, 裁判者只要证明自己的判决是依据规则作出的, 那么他的行动就被认为是正当的; 而立基于规则目的的判决, 则需要证明其他人在裁判者的位置上, 依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 目的缝隙实际上表明规则是以不同于规则目的的方式(稳固的普遍化)影响判决结果, 并且由于性质上的差异使得规则目的无法取代规则。此外, 即使仅从现象角度入手, 法律规则与其目的之间的缝隙也是清晰可见的。因为从法律规则中无法准确推导出规则目的, 就像我们无法从“故意杀人, 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则中, 推导出“禁止故意杀人”还是“保障社会秩序”是其准确的规则目的。即使我们承认它们都是准确的规则目的, 那么二者之间矛盾时又应当如何断定<sup>[11](P71)</sup>? 反之亦然, 我们无法仅从某一法律的“立法目的”推导出这个法律到底包含何种规则。

虽然稳固的普遍化与普遍化的特例之间的目的缝隙, 并不能作为否认规则存在的条件, 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 依然是我们面对的困难。必须注意, 解决过度包含与解决潜在包含的方式是不同的。由于过度包含是指将不适当的内容包含在规则的普遍性之中,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借助关于规则的解释方可进行。而对于潜在包含的问题, 则是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解决的<sup>[2](P17)</sup>。所谓的类比推理, 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不同但相似事物之间, 沿用同样的标准。例如, 我们之所以对火星感兴趣, 是因为类比推理引发的结果: 地球有水、大气、相当程度的体积、适当的温度还有生物, 火星同样有与地球近似的水、大气、相当程度的体积以及适当的温度, 因此火星上可能有生物。正是在类比推理的导引下, 我们才对火星抱有高度的热情, 因为这可能是太阳系除地球以外最可能存在生物的星球。显然, 类比推理得以展开的条件是两个: 事物之间不同与事

物之间相似。如果将这种推理形式适用于规则领域, 那么“不同”与“相似”就很容易同“普遍性包含的内容”与“普遍性未包含但规则目的包含的内容”挂起钩来。换言之, 所谓的“不同”, 是指两个事物中的某一个被规则的普遍性包含于其中、另一个被排斥在外; 所谓“相似”, 是指就规则的目的而言, 这些事物属于同一规则目的所指的对象。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 “顽皮的孩子”、“宠物熊”与“猴子”不是“狗”, 这就是“不同”; 但是它们(它们)都可能对用餐者造成某种程度的干扰, 这就是“相似”。因此, 对于携带后者进入餐馆的行为, 如有必要就可以适用依据“禁止携狗入内”这个规则; 当然, 将这个规则类推适用于儿童的情形可能存在其他的障碍, 例如可能引发对于儿童照顾上的困难或者没有足够的尊重儿童, 等等。这后面的反对意见实际上说明了如下问题: 当我们认为不应当将某一规则类推适用于某一对象时, 就必须举出二者之间“不相类似”的反例, 以此作为否定运用类比推理的理由。但是, 这种反对在某一对象上运用类比推理的主张, 依然是以类比推理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 只不过它试图证明的是“没有满足”类比推理的要求。

显然, 类比推理的核心在于“相似”, 而不在于“不同”。“不同”只是否定性的条件, 它禁止了将规则直接适用于待决事项。而要保证规则能够被类推适用于待决事项, 就必须证明它与规则普遍性所规定的事项之间存在相似性, 即它是规则之目的所包含的内容。简言之, 类比推理实际上就是依据规则目的, 而非规则对于待决事项的判断, 并将规则的后果适用于其上的过程。问题是: 如何证明上述相似性的存在? 答案还是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规则之目的这个问题当中。就理由的角度入手, 规则目的显然不是同规则一样的二阶理由, 它是一阶理由的范围; 同时, 待决事项不在规则之中, 对其适用规则就不会受到二阶理由的支持。结合以上两个方面, 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结论: 证明某一事项不在规则之中但符合规则目的的要求, 处于一阶理由的争论, 至于是否能够证明这一点, 这需要取决于证明者所提出的理由的

---

所谓的“一阶理由”是指具有分量属性的理由, 因此当存在多个一阶理由时, 需要具体考察这些理由的分量, 然后选择最具有分量的理由作为行动的基础。而二阶理由是指具有当然有时的那些理由, 即当一阶理由和二阶理由共存时, 二阶理由当然成为人们行动的基础。

强度。这也表明,证明二者相似的基于理由的论证过程可能是错误的——类比推理不适当的适用,因为证明者所举出的理由可能轻于反对理由。当然,支持二者“相似”的理由是否适当,是需要依据待决事项所处的情形进行通盘考虑的。因此,类比推理的重要特征,就是要在个别情形中进行综合的衡量与判断(有关类比推理主要特征的讨论,请参见 Cass R. Sunstein, *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7-69)。至于,如何寻找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已经是本文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却相似的待决事项(潜在包含)之上运用依据规则的类比推理,并没有挑战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和规则稳固普遍化的特点。因此,这种推理方式是处于规则之外的,也是规则观念所允许的。

本文的论证过程是为了证明:类比推理产生的原因在于规则普遍性以外的特例——潜在包含。只有当规则出现这种特例时,类比推理才有了用武之地;这表明,类比推理只是法律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法律推理的典型类型,因此试图将类比推理扩展到所有法律推理领域的做法必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与规则普遍化伴随的演绎推理,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它依然应当占据法律推理的核心地位,因为规则的例外并没有摧毁规则普遍性的基本特征。同时,由于潜在包含是规则与规则目的比较的结果,因此类比推理的核心在于规则目的而不在规则本身。这就展现了类比推理正当化的基本方向:对于类比推理任意性的限制必须同有关规则目的的讨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

#### 参 考 文 献

- [1] 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M].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
- [2] 罗伯特·阿列克西.论权衡与涵摄——从结构进行比较,刘叶深译[A].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 [3] FREDERICK SCHAUER. *Playing by the Rules: 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Rule-Based Decision-Making in Law and in Lif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4] ALAN H. GOLDMEN. *Practical Rules: When We Need Them and When We Do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 LARRY ALEXANDER. *Can Law Survive the Asymmetry of Authority?*[A]. LINDA MEYER. *Rule and Reasoning: Essays in Honour of Fred Schauer*[C].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9.
- [7] LARRY ALEXANDER, EMILY SHERWIN. *The Rule of Rules: Morality, Rules, and the Dilemmas of Law*[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GERALD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 [9] LARRY ALEXANDER. *Gap*[J].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1991) 14.
- [10] FREDERICK SCHAUER. *Rules and the Rule of Law*[J].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1991) 14.
- [11] 颜厥安.规范缝隙初探[A].杨日然教授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法律的分析与解释*[C].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

[责任编辑 李宏弢]

## Universality of Regulations and Reasoning from Analogy

CHEN Jing-hui

(Institute of Jurisprud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tudies focused on how to reduce the arbitrariness of reasoning from analogy, the reasons resulting in it are lack. If we can not find the reasons, other discussions will not be based on a solid found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kind of reasoning results from the exceptional case outside universality of regulations——latent inclusion. Only when we understand this can we know exactly that the importance of reasoning from analogy lies in the objective of the regulations.

Key words: regulation; latent inclusion; reasoning from analogy